

1948—1949年黄炎培的思想变化及北上

张 皓

【摘 要】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决战后,黄炎培主张蒋介石下野以进行国共和谈。蒋介石下野后,黄炎培拒绝李宗仁请其充当和谈的调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黄炎培思考北上参加新政协。他表明为人民大众服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北上后,他支持在八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签署和平协定,完成中国的统一。接着,他为上海的解放和接管做出贡献。随后,他参加新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工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意义。这样,黄炎培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关键词】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国共和平谈判;新政协

【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青海 西宁 810000)。

【原文出处】《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23.8.106~119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49年北平国共和谈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2LSA024)。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民主人士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是这一思想变化的关键时期。黄炎培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作为民盟留在上海的三大领导人之一(另两人为张澜、罗隆基),其政治态度颇受关注。大体说来,他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新民主主义者。虽然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黄炎培的思想变化做了一些研究^①,但是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他在1948年至1949年关键时期的政治思想变化,从中折射出著名民主人士的政治思想变化轨迹。

一、对国民党发起“和平”攻势和对蒋介石下野的态度

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政府一些官员希望通过在上海的黄炎培等人同中共沟通,立法委员刘不同即于1948年11月2日要求黄炎培向中共“传意愿和”。黄炎培一开始“婉谢之”,但同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讨论。11月3日至11

日,他先后同民主人士吴羹梅、胡厥文、庄茂如、周锦水、罗隆基、张澜、叶笃义、盛丕华等人讨论和谈“声明”^{[1](P147)}。对此,已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代表的身份于11月16日发表时局声明,强调民主人士不应介入和谈。声明指出:要想实现和平,就必须彻底铲除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障碍;如果希望在内战根源与和平障碍未铲除之前就同国民党反动阵营的任何派系妥协,则不仅不能实现真正而永久的和平,还会延长国民党反动派系的残暴统治。^{[2](P486)}国民党内顽固派也批评黄炎培等人的活动,CC系领袖陈果夫即指责“上海谣言更多,不堪入耳”^{[3](P203)}。

随即,黄炎培关注蒋介石是否下野。11月28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飞美国。11月30日,黄炎培认为她借口寻求美援飞美,实际上是逃离中国大陆:“蒋夫人飞美之前一周,有八个箱子飞运美,则此行之真目的别有在。至求援恐不过借题耳。”^{[1](P156)}12月1日,黄炎培同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后来为国民党政府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专门讨论蒋介石下野问

题。张治中说：“当八月间，蒋在牯岭，正考虑议和题目，电文白与邵力子上山，忽中止，则以蒋得经济新方案，大兴奋，谓此真可以制胜，和议之取消以此。翁、王误国殃民，罪应不赦。此次十一月四日，应召自兰飞京，累日详陈不能再战之实况，蒋谓：‘不战将怎样？’答和。蒋谓：‘和直是投降耳。’曰：‘公可暂休。’蒋谓：‘要我下野耶！下野我绝对不出此。’曰：‘那么打不下去怎[未]〈么〉办？’蒋谓：‘败就败耳，革命军人曾怕败邪！’”此为第一。第二，苏联认为，“蒋政权不去，必无办法，去，便有办法”。^{[1](P157)}文白，即张治中。张治中指出，他8月要求蒋介石考虑和谈，蒋介石也在考虑，但以为翁文灏、王云五进行金圆券改革可以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崩溃而中止；11月，张治中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但12月7日，民社党领袖张君勱对黄炎培称“蒋有意下野”，希望张澜和黄炎培等人“函劝”。黄炎培“即当受”，张澜则“立却之”。^{[1](P158)}可见，黄炎培有意接受张治中、张君勱的要求而劝说蒋介石下野和谈。

进而，黄炎培主张采取一定的程序，迫使蒋介石下野以进行和平谈判。12月12日，黄炎培同张治中晤谈国共和谈之步骤与方式，提出：一，“蒋宣言停战下野”；二，“中共响应停战”；三，“重开政协，决定一切”。他建议：此方案须“先征得中共同意”并“分洽美苏大使馆”；“在程序中，孙科缓就行政院长，在宣言中勿提到副总统”。^{[1](P60)}12月13日，黄炎培提出将此办法转告张群“共同进行”^{[1](P161)}。12月23日，黄炎培同民建其他领导人王艮仲、盛丕华、胡厥文等商讨“定请蒋下野文”^{[1](P164)}。12月27日，黄炎培写道：白崇禧自武汉致函他劝说张群、张治中“劝蒋下野”^{[1](P166)}。但是，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和谈五条件，黄炎培的努力落空。张澜指出：“显然蒋介石不愿意和。特别是蒋介石所提出的两个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关于保持法统与保障国民党军队这两点。这两个条件是人民所不愿意接受的。而且在文告的末段，蒋强调如有必要，他将继续作战。”^{[4](P333)}

1949年1月6日，杜月笙、潘公展、何世桢、程沧波、钱新之、徐采丞等人询问黄炎培“如何与中共通消息，呼吁和平”。黄炎培回答“无法通消息”，应“先

探明政府与中共间究竟有无接触”。众人商定“推新之入京，世桢与沧波访美领事，相约今天会谈，对外不发表”。^{[1](P171)}1月7日，桂系设法与民盟人士接触，梁漱溟称“如政府有事与民盟接谈，可与在沪之张澜、黄炎培商量”^[5]。1月9日，潘公展、杜月笙联名宴请民盟留沪人士张澜、罗隆基、黄炎培，张澜、罗隆基辞谢，但黄炎培“应邀与席”^[6]。1月10日，邱毅吾、夏梦辉以李宗仁、白崇禧“之招将入京”，询问黄炎培“对大局意见”^{[1](P172)}。这说明，在蒋介石文告发表后几天，国民党政府和杜月笙还在设法寻求和谈，黄炎培也未放弃斡旋的打算。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认为“和平前途有望”，因为“民盟份子需要获得一官半职，甚愿和平早日成功，作为进阶，此次必然竭力拉拢”。^[7]对此，民盟发言人发表声明予以批评，谴责蒋介石发表文告的目的，是以和平攻势延缓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便争取喘息时间编组军队。声明强调，蒋介石集团是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宣布民盟“非法”并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民盟领袖的罪魁祸首，宣布“我们和他们中间绝无‘和平’谈判的可能。他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及早放下武器，迅速无条件投降”^{[8](P499)}。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愿意同国民党政府及其任何地方政府、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谈，即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他指出八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争取真正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反动的和平。^{[9](P1389)}中共中央指出，八项条件深刻揭露国民党提出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反动的，指示向民主人士“妥为解释”^{[10](P30)}。黄炎培注意到八项条件，他的日记记载，“晨起读报，发现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如下：[剪报]《大公报》1949年1月15日”^{[1](P176)}。不过，他未作评论。

1月17日，行政院长孙科指示水利部长钟天心向黄炎培“征取和平意见”。黄炎培提出：“首应认定

大前提,仗是再不能打了,依此认定两原则:(一)和快有利,拖不利。(二)蒋在位和难,即和亦不利。蒋去,与和有利,且亦易。依此得最有利的办法:蒋去,同时宣布停战,言和。”钟天心问:“上海何以民间无人倡导和平。”黄炎培回答:“上海迄今尚是恐怖世界,谁敢说话。”^{[11](P174)}孙科无力也无法采纳黄炎培的建议,逼蒋下野的桂系则予以采纳。

蒋介石1月21日下野这天,黄炎培关注蒋介石的“行前种种”:一,“行前二小时,招李宗仁面授二电:一、即复叶引退电。二、为李代理电。要李签字。略谦辞照签。蒋将二电交吴忠信。蒋既行,发现引退电内仅有‘暂行引退’字样,李悔,拒绝代理。吴大窘,邀张群来商:改为‘身先引退’。时蒋抵杭,长途电话取得同意。乃定”。二,“行前原定以台湾为根据地,广州为大陆跳板,而粤军人有异动,将逐主席宋子文,亟罢宋,将粤政、军权交军人。欲改入渝,川人当局复电,仅称容来京面谈,而不表欢迎。台湾已为海空军及重要物资所集中。美国人表示:台湾不得为军事根据地。因对日和约未定,仅据开罗会议并非正式(此点力于于廿四日亲为余言,力于廿三答记者,和谈涉及台湾不可能,即指此)。实则美恐今日允归国民党,明日将为中共取得也。蒋因此只得去奉化”。三,蒋介石对陈立夫言,打败他的,不是共产党,“就是你们一班人”;大骂刘峙,刘峙回答:“不是我不肯打,士兵不肯打,奈何。”^{[11](P176)}显然,黄炎培认为,蒋介石仅仅“身先引退”而非去位,想到台湾却因美国反对而到奉化,推卸失败责任。

针对蒋介石的下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5名民主人士于1月22日发表声明,指出必须将革命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调和的可能,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体现了真正的和平,民主人士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迅速全部实现八项和平条件。^{[11](P501-502)}张澜发表书面谈话:“民盟同人一贯的主张是民主和平统一团结。三年残酷的内战,经过无数曲折,牺牲人民无数生命财产。同人为了这种奋斗,亦牺牲不少生命,且最近依然有许多盟员丧失自由。今幸蒋介石先生以引退要求和平,中共亦早经发表和平条件,我们希望从速有进一步的发展,使和平早日实现。我们深信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

望。”^[12]相比之下,张澜的语气不如55名民主人士坚决,他虽然指出中共发表了谈判原则,但认为蒋介石“以引退要求和平”。

桂系骨干李品仙称,李宗仁就职后与“共产党的同路人连络斡旋和平”^{[13](P246)}。这包括黄炎培在内。1月22日,甘介侯作为李宗仁的私人顾问,到上海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到南京去帮助政府恢复与共产党的和谈”^{[14](P78)}。李宗仁致函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并转民盟“诸先生”,表示自己“决以最大之努力谋和平之实现”,要求民盟“一致主张,力加赞助”。^[15]1月23日,李宗仁打算到沪“亲请孙夫人、张澜、黄炎培、李济深等来京”^{[16](P25)}。他称,这些民主人士同他“十分友善”,他可以推动他们“对中共增加压力”同意和谈。^{[17](P655)}

黄炎培等人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甘介侯称,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一方面已了解李宗仁准备以八项原则“为和谈基础”,一方面表示对李宗仁的“和平努力,深寄同情”,“只要能促进中国的真民主与真和平,我们绝不敢逃避责任”。^[18]按此,黄炎培等人答应帮助桂系“求和”。罗隆基则指出:邵力子、张治中来沪邀请民盟领袖“参加南京政府的和平努力”,但“民盟不能在这个时候参加讨论,理由很多”。合众社电称:“上海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虽然表示赞成南京政府对和平的努力,但并未同意赴京积极参加活动。”^[19]中共对此也有关注,“邵张在沪活动,似未达其分化之目的”,“与民盟人士所谈,也‘未获进展’”。^{[16](P27)}

针对李宗仁对张澜、黄炎培等人的工作,中共进行了争取。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将1月22日55名民主人士的声明和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的谈话,连同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向国统区各大城市散发,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和平欺骗,特别是注意争取中间人士。^{[20](P82)}1月28日,周恩来电示从事统战工作的吴克坚:向仍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说明,要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所表明的立场,以实现真正的和平。^{[21](P830)}周恩来还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及李宗仁等人接受八项条件,并立即逮捕蒋介石、陈立夫等一大批主要战犯,那便是好的:如果对国民党政府

只提出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活动、恢复民盟活动等,则很危险,因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对前项要求不一定提出,对后项要求则会赞同,而国民党政府又会在形式上接受后项要求,其结果不仅使民主人士被动,而且有人会因此认为中共承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到解放区的周建人、翦伯赞、田汉等民主人士也致电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要受李宗仁的蛊惑。^{[22](P31-32)}

1月下旬,李宗仁再次争取张澜、黄炎培等充当和谈的调人,张澜、黄炎培拒绝。1月27日,张澜指出:民盟在之前的国共冲突中持中立态度,而现在局势已发生转变,国共之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民盟要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能充当和谈的调人。^{[23](P509)}表明张澜、黄炎培等人立场发生重大转变。1月30日,李宗仁飞沪“再次拉拢民主人士及孙夫人”,但是“毫无结果”。^{[16](P33)}接着,甘介侯携李宗仁信函又到上海争取。2月3日,张澜、罗隆基、黄炎培联名回函李宗仁不能应邀。回函将黄炎培斡旋和平谈判的活动画上了句号。继之在2月6日,黄炎培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Cabot)“谈中共政策”^{[11](P180、P181)},这是黄炎培对美国政府解释中共有关时局发展的政策。

可见,黄炎培在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战略决战后主张国共和谈,建议并赞同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努力寻求黄炎培等人的帮助并邀之作为和谈的调人。是否接受这一要求,黄炎培不断与他人协商讨论^{[11](P176P177)},1月27日是他和张澜、罗隆基态度转变的节点。《华商报》2月1日总结了李宗仁的要求和黄炎培等人的回应:李宗仁要求和谈,并不断派人到上海要求民主人士斡旋,民盟留沪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成为各方关注的人物。张治中、邵力子、甘介侯到沪“争取”,但遭到严正拒绝。张澜以民盟领导人身份发表谈话指出国共冲突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民盟要站在革命一边而不能充当调人。因此,李宗仁的希望落空,所谓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对和谈乐观”“全系捏造”。^[24]

二、取道香港到北平:“秘密走出蒋管区,进入解放区”

随着拒绝充当国共和谈的调人,黄炎培设法北

上参加新政协。

中国共产党1948年发出“五一号召”后,创始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响应,孙起孟指出:“民建响应五一号召,明确地接受了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是它对国内问题立场上的一大转变。”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主要通过孙起孟同民建和黄炎培“保持联系”。^{[25](P88)}

如果参加新政协,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要讨论什么问题?叶笃义指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4人10月间协商以民盟留沪中央委员的名义向中共提出建议书,提出四大主张:“内政上实行议会政治”,外交上对美苏两国实行同样友好的方针,“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民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26](P67)}显然,这深受美国影响,同新民主主义有很大距离。留沪民盟中央委员讨论建议书时,史良、楚图南、郭则沉提出反对意见。

10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新政协由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团体、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组成,也“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27](P185)}。这里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准,“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指一些民盟留沪的中央委员。已经北上的民主人士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是否参加新政协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谭平山提出,如能“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沈钧儒等人认为,中共提议参加新政协的“如再有增加单位”,可以随时协商,由新政协筹备委员会讨论作正式决定;这一提议给“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参加新政协“留有余地”。^{[27](P189)}“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显然包括仍在沪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在内。

包括黄炎培在内的人士也在思考如何为新政协做贡献,《华商报》10月24日指出:在上海,“一般头脑清楚”的工商业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究竟能对新政协”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新政协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28]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的高岗、李富春:由于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不必召开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可径直召开新政协产生。因此,应多多邀请能够与中共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中间偏右”的参加新政协,以扩大统一战线。^{[21](P815)}这进一步明确邀请黄炎培这样的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

在这种情况下,黄炎培面临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拘禁甚至暗杀,《华商报》指出,“只是为了新政协的号召,黄炎培已被暂行监视”^[28]。杜月笙、张治中出面斡旋。11月22日,杜月笙通过胡叙五转告黄炎培“政府将不利于”他,“在此数日内宜暂避”,黄炎培“因照办”。^{[1](P154)}11月31日,杜月笙又嘱咐胡叙五转告黄炎培“势已松懈,可无须避了”。12月1日,黄炎培同张治中“畅谈大局”,张治中表示已要求其学生、宁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不要“不利于”黄炎培,并介绍汤恩伯与黄炎培“相见”,黄炎培等人“即兴辞出”。^{[1](P156)}1949年1月3日,卡波特向美国政府报告了与叶笃义的谈话: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培仍在上海,他们“没有一人离开上海到满洲或其他地方,原因更多的是旅行困难而非被监视”^{[29](P4)}。1月15日,张群对黄炎培屡次几乎被捕事“非常诧异”^{[1](P174)}。1月27日,郭松涛夫人对黄炎培说:“某方”又将采取绑架或暗杀手段对付黄炎培、张澜和罗隆基。^{[1](P178)}2月3日,见到黑名单的叶笃义对黄炎培说其“首列”^{[1](P180)}榜单。

黄炎培何时北上,与中共何时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程安排有关。在1948年12月30日致斯大林电中,毛泽东提出在夏季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指出中共高度关注美国 and 国民党企图引诱黄炎培等人组建反对派联盟:“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便利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这个新的阴谋有一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中国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

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30](P331)}1月6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是否“会掌握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动权,在夏季到来之前先建立自己的联合政府,将中国的一些民主人士吸引过去”^{[31](P339)}?对此疑问,毛泽东1月7日回答:“如果国民党要建立联合政府,我们也不害怕。也许,这甚至会更好一些。民主人士中不会有人靠向国民党这一边。”他进一步指出:各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反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对蒋介石的和平叫嚣置之不理。大多数民主人士已来到解放区,在上海只有张澜、罗隆基和黄炎培“三个右翼民主人士”,后两人也想到解放区,但中共尚未对他们发出邀请。^{[32](P342-343)}在这里,毛泽东将黄炎培列为“右翼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待中共的安排北上。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许多民主人士已经来到解放区或正要来到解放区。^{[33](P16)}

1月30日,沈钧儒在沈阳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更加积极的展开工作,特将民盟总部移至解放区。”^[34]这意味着黄炎培要寻找时机离沪北上。2月15日,他易名王正方悄然前往香港。黄炎培自叙:“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我与爱人姚纬钧乘汽车出弄,扬言赴永安公司购物,特务尾追,我们自公司前门入,边门出,坐上王良仲预留的汽车到吴淞口,由中共同志陪同,搭特备轮船去香港。为了遮掩特务耳目,家中还大宴宾客三天。到第三天,报载黄某离开上海了。”^{[35](P106)}至于张澜、罗隆基两人为何未离沪,叶笃义解释,罗隆基说“浦熙修现在被关在狱里,我一走就一定连累她”;张澜说“罗要不去,他也不去”,又说“新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在南京或北平这样大的城市里召开,他才准备出席”。^{[26](P69)}3月10日,黄炎培致函钱新之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监事:“弟今以不得已之故,为良知所驱使,而离沪矣。此行纯是个人动作,于本社绝无联带关系,行前并不可能向诸位先生预告,尚求谅解!”他提出:“同在高天厚地之中,愿为民主和平而努力。”^{[1](P196)}

2月19日,黄炎培到达香港,频繁出席活动。当日,他出席民建港九分会成立会。2月23日,他报告

“在沪同人近况”“大局变化经过”和“脱走来港经过”。民建会餐上讨论民建的立场:民建代表的是民族工商业企业者,它是政治性团体,它同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团结、合作。^{[1](P188、P1889)}2月24日,他同陈叔通、张志让、马寅初、郑振铎等与潘汉年、方方、许涤新、夏衍等讨论战犯名单。国民党政府注意到这些人士的言论,时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熊式辉在2月25日日记中写道:“民盟份子谈话精彩,谓共党右翼与国民党左翼有合作之可能。”^[36]3月2日,在工商叙餐会上,黄炎培提出民建本着四大原则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一,行动要符合大众的利益;二,同为大众谋利益的政党合作,而与反对者进行斗争;三,对外加强斗争,对内加强合作;四,限制私人利益,增进公共利益。^{[1](P192)}在这些公开的活动中,黄炎培表明了民建的性质、为大众利益服务、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贡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黄炎培离开香港北上时间与民盟总部迁到北平的安排联系在一起。3月5日,在北平的民盟17名中央执行委员成立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民盟总部迁移工作完成之前的临时领导机构,“并经公决香港联席会议应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3月7日,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致函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早日命驾来平参加领导”^{[37](P518)}。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正式邀请电,邀请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北上参加新政协。这样,黄炎培于3月14日离港北上。参加接送工作的钱之光指出: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主要有四批,他们“从一九四八年八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38](P519)}。黄炎培属于第四批北上。

黄炎培北上之行的含义深刻,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制度的重大发展。3月20日,民盟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彭文应对卡波特解释民盟站到革命一边之因:民盟“极其渴望迅速结束内战,解除中国人民极度的痛苦”。如果支持国民党,就“只会帮助它拖延不可避免的失败”,如果站到革命一边,就能迅速结束内战,“将中国老百姓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为经济复苏提供基础”。^{[39](P196)}3月2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宣布与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尽可能团结能够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态度,又要反对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40](P196)}在这重大发展之下,黄炎培于3月26日在《华商报》发表《北行答问》一文,阐述其北上之意义、志愿和期望。

其一,北上之意义,在于公开表明站在革命之一边。黄炎培指出:“我对国事的主张,曾和一般志同道合的朋友,认定新中国所需要,是民主、和平、统一、建设。我们该在这上边努力,这是很早就认定的,也曾实际努力过的。料不到好多朋友,为了这些,丧失了他们的自由,至今还没有恢复;更可怜的,许多朋友为了这些竟会牺牲掉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明白了,这不是别的,而已演成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反独裁和独裁的斗争。那么,我们这群人,早已站在革命者和反独裁者的一边了,还有什么疑问呢?”^[41]

其二,北上之三个志愿,在于向人民大众学习,为人民大众服务,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黄炎培表示:“第一、我也想向大众学习一下。我们认定人民是具有不可抵抗的潜在力量的。几百千年来,这股力量,被压伏着,被埋藏着,像地底下宝藏一般,最近经中共发掘起来了。它的本质怎样?和它的行动怎样?我们不单是需要认识,并且需要去学习。我相信向已经站立起来的民众学习,必定有很多很好的收获。这是很有意义而且是很有趣味的事。第二、我照常想替大众服务。我从廿五岁起,一贯地担任的是教育工作。可是四十七年以来,所接触的社会,总是死沉沉的。解放区广大的民众都站起来了,活了。在这中间,一定有更多的服务机会。我的年龄虽然慢慢地在老,但一张嘴,一枝笔,还可以用一下。这时候,大家都在卖力,在吃苦,我更万不该也万不忍偷懒的了。第三、我的生活愿和大众共甘苦。我去解放区,虽然免不了消耗一分口粮,总想不超过一般水准。我和我妻,共同立下一个志愿。如果环境和时间许可,想干我俩的本行,当一个教员,到时生活上取得一分和大众相同的物质的供应。这样,在人民政府之下,做一个身食其力的人民,心上也许比较平安,而且还会感得相当的快乐。”^[41]

其三,北上之期望,在于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黄炎培指出,对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过去一个一个政府,从不会也从不肯在这些地方用心用力,现在我不能不寄热切的期望于人民政府了”。“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他们自然甘心拿出所有力量来克服自身精神上物质上种种困难。只是需要智识和热诚的领导,和健全的计划,而中共各位领袖,根据崇高的理想,划定革命阶段,认清革命的真理,从源头上说,在扶助一般民众解除痛苦,在纠正社会一切不合理现象”,“在新民主主义之下,逐渐的彻底的合理解决,进而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这是我到解放区去放在心头的最深切的期望”。^[41]

3月25日上午,黄炎培抵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等到车站迎接。下午,他们一起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邀请20多人晚餐,黄炎培受邀。餐毕,毛泽东谈起国共和平谈判问题,指出:“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决不轻易渡江,亦决不停战。”^{[1](P203)}3月26日,毛泽东单独招待黄炎培,黄炎培“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依此,黄炎培3月28日“写成电稿五通,面交与李维汉发”:“电上海王良仲等”请冷通北上,“良仲偕来”、“吴承禧等来”;“电香港李一平,复两点,促早来”;致电在香港的民建理事寿墨卿等人关于“工商考察团事”;“电陈嘉庚,促早来”;“电陈仲闾,报告抵平”。^{[1](P204)}4月8日,张澜等人对黄炎培提出“有志北来,嘱设法飞机”^{[1](P210)}。4月11日,黄炎培同张治中、邵力子“商派飞机迎张表方、杨卫玉等来平事,见表赞成”^{[1](P211)}。4月15日,黄炎培致函上海徐采丞“并转良仲,分送表方等及卫玉等,请赴京飞平”^{[1](P213)}。

4月1日,民建“决议由黄炎培代表民建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联合声明上签名”,这“为后来黄炎培当选为民建中央主任委员奠定了基础”。^{[25](P89)}4月3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协商发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黄炎培代表民建在宣言上签名。他指出宣言的要点为: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竟敢挑起世界战争,那么中国各民主党派将团结中国人民,遵守孙中山的遗嘱,同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

共同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民建在对外政策上表明反帝立场,黄炎培指出“当时称为‘一边倒’政策”^{[1](P208)},黄炎培代表民建“参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是民建“在对外立场上的一大转变”。“民建决定在这个联合声明上签名,对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它在成立宣言中提出的‘对于美苏两国,必须采取平衡政策’的立场说来,毫无疑义,是一个重要的突破。”^{[25](P88)}

综上所述,黄炎培在拒绝李宗仁充当国共和平谈判的调人之后,思考如何北上参加新政协。他指出,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民族工商业企业者,要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要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三、黄炎培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前面已指出,黄炎培主张蒋介石下野以和谈,但拒绝作为国共和谈的调人。他抵平后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其实质是人民解放军以何方式完成中国的统一,他争取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签订和平协定。

国共和平谈判于4月1日开始举行,包括黄炎培在内的民主人士积极做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的工作,并要求李宗仁、顾祝同来北平促进和谈。同日,民主人士“会商对今日来平之南京和谈代表如何应付”^{[1](P207)}。张治中等代表到北平后“和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黄炎培、傅作义、邓宝珊等都有接触”^{[42](P332)}。4月5日,李济深、黄炎培等人具名请李宗仁来北平,“公推朱蕴山、李民欣下午飞京带致”;请朱蕴山、李民欣带信给顾祝同,“讯请来平,述中共尊民意,求和平,来则公私两益”,最好冷通、王良仲“偕来”。^{[1](P208)}

4月3日,毛泽东对民主人士介绍“和谈的经过文件与今后方针”^{[1](P207)}。4月5日,周恩来向民主党派人士通报“两日和谈经过”^{[1](P208)}。这解释了中共的立场,要求民主人士共同努力。4月6日,黄炎培访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谈和平问题”^{[1](P209)}。4月7日,黄炎培对新华社记者朱君来授以《满江红·赠和谈诸代表》:“苦了诸君,衡阳雁,才南又北。谁复念八年

抗战,万家血肉。谁杀李闻天下士,谁翻政协和平局。更飞机大炮送将来,谁遗毒。”“金圆券,千村哭。王云五,罪难赎。问豪门四大,是谁家族。众怒由来非可犯,南京暴行徒羞辱。劝八天签字莫迟疑,速,速,速。”^{[1](P210)}李闻即李公仆、闻一多,黄炎培劝说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尽快签字。

4月10日,报纸登载李宗仁4月7日致电和毛泽东8日的复电,黄炎培注意到李宗仁表示“和谈采纳八条为基础,立国大计愿与中共携手,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建设新中国使命”。毛泽东表示“和谈采宽大政策,为求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愿早日结束战争,与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黄炎培认为“这是和谈一大进步”。4月11日,黄炎培同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竑“谈和平问题”,张治中、邵力子来同黄炎培谈“四日以来,与毛主席谈话分组的经过”。^{[1](P211)}4月13日,到南京同李宗仁沟通的朱蕴山返回北平向黄炎培、朱学范“详尽报告南京情况”^{[1](P212)}。由此可见,黄炎培认为国共和平谈判可期成功,因此积极与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交流意见。

4月13日早,毛泽东指示周恩来:4月13日晚同各民主党派代表10人举行一次会议,向民主人士通报国共和平谈判的进展,但要他们保守秘密,不能下达。^{[43](P222-223)}根据这一指示,周恩来在会议上通报了进展,并征求他们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这10人中有黄炎培,自叙周恩来“报告和谈现况,出示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旋即收回”^{[1](P212)}。接着在4月14日,周恩来委托李维汉进一步向包括黄炎培在内的部分民主人士通报情况,并征求意见。黄炎培总结说:周恩来、李维汉介绍了国共双方代表正式会谈情况,周恩来说,“仅存二问题:(1)过江军队。(2)设军事整编委员会。两问题大致已得各代表谅解,此协定草案热爱和平,但态度极坚决”^{[1](P213)}。4月16日、17日,周恩来又两次邀请包括黄炎培在内的民主人士谈话,指出:国民党“之所以提出和平建议”,企图“划江而治”并获得喘息机会。国民党的本意如此,但是中共为了实现和平,仍然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中心是接收国民党政权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这关系到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国家一定要统一,不论采取战斗的方法还是和平的方法。^{[21](P843)}4月

17日,黄炎培“收到中共交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及协定本各一份”。4月18日,黄炎培对新华社记者书面答复“关于和谈的意见”。^{[1](P214, P215)}

黄炎培担心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平协定,在其拒签后赞成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对于4月20日“为和平协定签字最后期限”,邵力子对黄炎培说,“南京有电,消息殊不佳”,黄炎培批评“南京中央社消息甚恶”,指出“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完成,已成箭在弦上之势”。^{[1](P216)}4月21日,周恩来、李维汉向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和谈决裂情况,征求意见”,张治中对黄炎培说南京“嘱代表团回京”,黄炎培“主张不宜归去”,并要求周恩来“请勿放代表团归”。^{[1](P217)}4月23日,黄炎培以民建常务理事身份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声明表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公允合理,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指出中共欢迎国民党内“有正义感之爱国人士”参加民主、和平新中国的建设。声明批评国民党政府内的负责分子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要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号召国民党阵营内“忠贞爱国、明晓利害之人士”依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进行局部的和平解放,以减少人民承受的灾难和完成国家的统一。^{[44](P522-523)}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全中国,黄炎培关心上海的解放和接管。

还在上海时,黄炎培就关心上海安全。他在1948年12月20日应杜月笙邀请“谈上海局势”时,向杜月笙提出三点希望:“一、军警饷项维持,但力戒胡乱开枪;二、粮食准备;三、力嘱当道勿捕人。”杜月笙“答当可做到”。^{[1](P164)}

中共中央重视黄炎培在上海解放和接管中的地位。黄炎培抵平后于1949年3月28日致电即将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表达很快会面的希望:“弟今已抵平,特向兄遥致敬意,握手欢迎,为期不远,珍重珍重。”^{[45](P275)}4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东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民建的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等人已到北平。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接收和管理上海如无他们的帮助,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

强大的联合势力”，要采取一定的方式、设置必要的机关，吸收他们参加解放上海和接管的工作。中共中央特别强调：“黄炎培给陈毅同志的电报应给以回答。”^{[46] (P213-214)} 6月1日、25日，中共中央两度电示华东局、上海市委，聘任黄炎培、史良、章乃器等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中共中央指出：这14人均要参加新政协会议，只能在上海停留一个月。在此期间，要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以便尽快恢复生产，打通南北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分子对上海的破坏活动。^{[47] (P27)}

4月15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谈话，黄炎培表示愿为上海解放贡献力量。4月24日，他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上海即将解放，号召上海同胞团结起来迎接解放。黄炎培6月25日到上海，7月26日回北平，中共中央要求他“利用在沪期间联系各方多提意见”^{[47] (P27)}。上海即将解放时，黄炎培5月17日向即将出任副市长的潘汉年提出几条建议：恢复繁荣，救济失业；“及早设立人民法院”；优待外侨。^{[48] 6月30日晚，华东局、上海市委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千余人举行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纪念大会，黄炎培应邀到会发表讲话，“一致表示拥护中共领导，以充分信心与决心，为发展生产，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49]。7月20日，黄炎培向陈毅提出，为增加生产，繁荣经济，既要公私兼顾，又要劳资两利。在上海期间，黄炎培和陈叔通等民主人士提出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意见：向工商界人士解释中共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帮助解除他们的顾虑；应周恩来的委托，致电在香港的钱新之、陈光甫、刘鸿生、杜月笙等人早日回归，同周孝怀商谈民生公司事宜；推动工商业界慰劳人民解放军，举行捐献、义卖活动。总之，黄炎培为上海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返回北平后，他在8月1日建议毛泽东：派员巡视江浙地方政治并加强干部培训；尽可能分化英国、美国；举行上海商民联欢；人民币和银行人员下乡；中国各大区实行联营、推销物资；民营工厂同样成立中共组织、共青团组织。^[48]}

黄炎培返回北平后，参加新政协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在新政协会议代表中，民盟所占份额重要，黄炎

培不仅代表民盟也代表救国会。6月9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柯乐布(Clubb)报告美国政府：“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代表的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前分配给民盟3名代表，即沈钧儒、章伯钧和周新民，现在达到7名，增加了张澜、罗隆基、张东荪和另外一名。参加筹备会议的民盟人士还代表了其他党派，特别是黄炎培代表救国会，吴晗代表平津教授，曾昭抡代表北大科学工作者协会。这样，民盟代表总数达到10人或12人。”^{[50] (P376)}

随着筹备新政协会议，黄炎培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7月16日，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决定联合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苏友好协会”，选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81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51]。7月17日，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推定宋庆龄担任主任，周恩来、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炎培担任副主任，钱俊瑞为总干事。这说明，黄炎培克服了以前在美苏之间的中立立场。

以批评美国白皮书为契机，黄炎培做好参加新政协的思想准备。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叙述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至1949年间的中美关系，特别叙述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经过。对此，新华社发表五评白皮书，“帮助人们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揭穿它妄图扶植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诡计”。在这之下，“民建怎么办？它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在对外立场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5] (P89)} 8月24日，民建发表声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怎么也不会走上美帝国主义所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的道路，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民族资产阶级唯一光明而幸福的发展道路。^[52] 这一声明意义重大，毛泽东充分肯定而对黄炎培指出：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抛弃对美国的幻想具有极大的教育作用；声明生动、积极、有原则、有前途、有希望，表明民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必备的条件。8月26日，毛泽东又对黄炎培“不仅强调肯定了民主党派建立理论的必要性，而且对民主党派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给予很大的鼓励”，指出民建的声明不仅仅是对白皮书的批判，

而且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动地走上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有利于今后民建和中共的合作。可见,“民建的这种政治准备,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及同各民主党派一起制定和接受共同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25](P90-91)}

黄炎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出了贡献。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担任第四小组副组长。该组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董必武为组长。黄炎培、张志让等人提出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53](P563)},张奚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17日,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原则上通过第四小组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指定董必武、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进一步修改草案”^{[54](P534)}。修改完毕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权性质和组织结构。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黄炎培代表民建发言。他指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是人类历史上“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会议要建造一所新大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柱子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其他爱国分子;柱子的钢筋水泥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是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工作总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55]

黄炎培形象地阐述了新政协召开的历史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他表示:要感谢建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解放军和他们的朱德总司令,要感谢领导建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他号召民族工商业者共同努力“来建造这所新的大厦”^[55]。总之,他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奋斗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意义,坚信人民的新中国一定会建设成功。^[56]

10月1日,毛泽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黄炎培任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他发表书面意见进一步强调两点: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我中华民族经过了一百多年来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者武力侵略者的苦斗,经过了几十年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苦斗,仰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其二,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即是需要与各国友邦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大原则之下,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承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苏两国携手“构成整个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来促成全世界人民民主的普遍进展,因而保卫全世界持久和平”。^[57]

这样,黄炎培在三方面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反映了以何方式统一全中国,黄炎培支持在中共八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签署和平协定。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黄炎培关心其解放和接管,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建议。在新中国诞生之时,黄炎培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强调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总之,黄炎培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变化反映了在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变化轨迹,也折射出一些民主人士的思想变化轨迹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政治性质的变化。在那一时期,民主人士分为左翼、右翼两部分。左翼民主人士以李济深、沈钧儒等为代表,他们在中共发出“五一号召”之后即设法北上进入解放区。右翼民主人士以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为代表,他们在思想上存在三大问题,他们疑问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要民主人士。他们主张在共同纲领中写民主主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立态度而不要“一边倒”。这些看法的本质,是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反映。黄炎培将其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概括为三个方面,“参加民主团结工作,发起民主团结”,“秘密走出蒋管区,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工作”。^{[35](P6)}与此相适应,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他从主张国共和谈到支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从主张民主主义到接受新民主主义,从主张在美苏之间持中立态度到接受“一边倒”。他的思想变化,在民建接受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上得到深刻的反映。对于黄炎培的思想变化和民建成为民主党派,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对黄炎培指出:民建以前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走“中间路线”,随着历史的变化,“中间路线”发生分化,民建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58](P520)}

注释:

①朱丁睿、臧运祜所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关系——以“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黄炎培为例》(《北大政治学评论》2021年第3期)一文指出,黄炎培在中共“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完成思想转变,支持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并最终北上。另一文《转变:新中国成立前黄炎培对新民主主义的体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的1945—1949年间,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两大民主党派要职的黄炎培,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

参考文献:

- [1]黄炎培日记:第10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 [2]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章伯钧发表时局声明(1948年11月16日)[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 [3]温乐群.陈果夫日记摘录:下[A].近代史资料:总132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4]评蒋介石元旦文告(1949年1月6日)[A].张澜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 [5]“和平”方兴未艾[N].华商报,1949-01-08(01).
- [6]张澜罗隆基谢绝潘公展邀宴[N].华商报,1949-01-11(01).
- [7]今日明日[N].华商报,1949-01-11(01).
- [8]中国民主同盟申斥蒋介石的“和平”阴谋(1949年1月10日)[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

资料出版社,1983.

- [9]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A].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中央关于解释八项和平条件的指示(1949年1月15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11]中国民主同盟领导成员暨各方面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 [12]张澜谈话[N].中央日报,1949-01-23(02).
- [13]李品仙回忆录[M].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 [14]893.00/2- 2449: Telegram.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hanghai, January 24,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 [15]李代总统努力和乎[N].中央日报,1949-01-23(02).
- [16]杨尚昆日记: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17]李宗仁回忆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 [18]甘介侯在沪招待记者[N].中央日报,1949-01-25(02).
- [19]孙夫人立场坚定[N].华商报,1949-01-26(01).
- [20]中央关于广泛揭破美蒋和平阴谋的指示(1949年1月25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2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2]李维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序幕——北平和谈[A].石光树.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 [23]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就李宗仁要求民盟“调解”发表严正谈话(1949年1月27日)[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 [24]张澜等辟谣[N].华商报,1949-02-01(01).
- [25]孙起孟.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参加人民政协的二三事[A].石光树.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 [2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 [27]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
- [28]上海人厌恶蒋政府[N].华商报,1948-10-24(04).
- [29]893.00/1-349: Airgram.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hanghai, January 3,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3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1948年12月30日)[A].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

[3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1月6日)[A].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

[32]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1949年1月10日)[A].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

[33]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34]民盟总部迁解放区[N].华商报,1949-01-31(01).

[35]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36]熊式辉日记(抄本,1943-1949)[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代史所藏.

[37]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会函告张澜等总部临工会在北平成立(1949年3月7日)[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38]钱之光.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A].石光树.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39]893.00/3- 2349: Telegram.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Cabo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Shanghai, March 23,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40]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1949年3月23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41]黄炎培.北行答问[N].华商报,1949-03-26(01).

[42]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M].台北:独立作家,2015.

[43]关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49年4月13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44]中国民主同盟与各民主党派为拥护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发布进军命令发表联合声明(1949年4月23日)[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45]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1949年4月7日)[A].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6]中央关于京沪杭地区应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7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47]中央关于聘请一批党外人士为上海市政府顾问的电报(1949年6月25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48]殷之俊,王海波.解读1949年中共中央三份密电[J].世纪,2009,(4).

[49]沪各界开会纪念“七一”民主人士宋庆龄等均参加[N].人民日报,1949-07-02(01).

[50]893.00B/6- 1049: Telegram. The Consul General at Peiping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iping, June 9,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51]中苏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N].人民日报,1949-07-17(01).

[52]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警告美帝好梦做不成[N].人民日报,1949-08-24(01).

[5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54]893.00/9- 2449: Telegram. The Consul General at Peiping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iping, September 24,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5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各单位代表讲话[N].人民日报,1949-09-22(02).

[56]“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特写[N].人民日报,1949-09-22(01).

[57]各党派团体负责人发表书面意见[N].人民日报,1949-10-08(02).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